

---

# 新时代协商治理:内在机理与基本立场

魏崇辉 王岩<sup>1</sup>

**【摘要】:**当前,学界仍然需要对“治理”做中国情境的整全性探讨以克服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倾向。要树立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学术立场,特别要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之本土化因素及其核心指归的梳理,凝练基于学术的中国协商治理之基本指导的理论精义,建构一种适应性的本土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底线性的协商治理理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基于此,以什么形式实践协商治理,应交由党领导人民去完成。同时,要科学把握西方治理嬗变、理论适用性及其困境,科学认识治理中国方案的定位、中西方治理的本质差异及其体现。对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超越性之内在机理的研究,是解释与建构的尝试,是对情境的宏观考量,亦是阐明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的过程。

**【关键词】:**协商治理 中国方案 西方治理 内在机理 基本立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积极探索“更好社会制度”<sup>[1]</sup>。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做了概念与制度层面的确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确定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

在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验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与总体要求,并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方面的制度的战略部署,透析了“中国之治”的美好前景。这为学界开展协商治理相关问题研究,推动协商治理理论发展与实践前行指明了方向。

本文以为,知识的获得与辨识取决于不同的解释与建构,取决于变化中的情境,而解释、建构与情境又与立场密切相关。对协商治理逻辑框架的研究,是对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超越性之内在机理的研究,是解释与建构的尝试,是对情境的宏观考量,同时是阐明基本立场的过程。

对于“立场”,习近平强调指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sup>[2]</sup>本文将其从理论(观察、认识问题)与实践(处理问题)两个层面做综合论述。从更高的学术目标来看,同时是在以学术呼应<sup>1</sup>实践上做出的努力。

## 一、协商治理研究之学术梳理

一般认为,1989年世界银行讨论非洲发展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是当代西方治理理论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肇始。治理在西方世界的功能更多体现在政策层面,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体现在制度上。20世纪90年代当这一新兴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时,恰好迎合了这一世界上最大转型国家改革的需要,促使学界展开了对其是否具有适用性的广泛而持续的探讨。

于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治理”一词首次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是在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

<sup>1</sup>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岩,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9JZD009)

---

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sup>2</sup>“治理”经历了从以自然环境为对象到以社会事务为对象的演进，并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升到改革的总目标的高度。对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是避免重复叙事以造成学术浪费的基本步骤，同时通过归纳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以启发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治理学理深化与本质批判。当前，治理类型演变与拓展、治理实践样态及矫正研究是西方学界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治理理论的主要立论者往往也是批评者，如斯托克、杰索普、皮埃尔等，批评大多集中于理论内部的不协调倾向、理论适用的国别差异以及作为“元治理者”的国家作用的有效发挥等方面。

本质上，“‘没有政府的治理’是西方致力于扩散的‘柔性’意识形态体系”。<sup>[3]</sup>正如福山始终对“治理有方的政治实体”的意识形态坚持那样，尽管“……其初版叙事进行了微调”，“相对提升了秩序与权威之于自由民主权重的同时，却仍保持了对‘历史终结论’信条和自由民主制基本面的坚持”。<sup>[4]</sup>

第二，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研究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其一，译介、阐释治理理论的基本理念及其发展态势。俞可平<sup>[5]</sup>在译介治理理论的同时，努力探寻以“治理”这一“温和”的词汇阐发政治议题，包括而又限于社会成长与成熟、民主的推进等。

徐勇<sup>[6]</sup>试图挖掘治理的公共权力意涵并以此发展出历史叙事。陈振明归纳出治理理论研究的途径：政府管理的途径；公民社会的途径；合作网络的途径<sup>[7]</sup>。李泉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启动”“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尝试”“马克思主义的妥协”“开拓性的理论综合”等角度对中国情境下的治理理论研究做了归类<sup>[8]</sup>。

晚近对国际学界治理研究做出敏锐追踪的有王浦劬与臧雷振编译的《治理理论与实践：经典议题研究新解》、Stephen P. Osborne 的《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sup>[9]</sup>。

田凯、黄金的《国外治理理论研究：进程与争鸣》<sup>[10]</sup>梳理了二十余年来国外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及主要论争，指出治理理论的核心与危机，并基于对国家作用的不同理解，将治理理论做了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划分，指出由于在概念和论证逻辑上具有模糊性，治理理论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范式，需要处理好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之间的关系。

其二，治理理论中国适用研究。着重于治理理论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取得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分析。王诗宗<sup>[11]</sup>集中而系统地探讨了治理理论的兴起及其批判者、贡献及其中国适用性。质疑治理理论适用性，揭示其意识形态性者多以不同的理论情境与意识形态背景、官本位的阻梗、现代国家建设不到位<sup>[12]</sup>为抓手。

第三，国家治理与协商治理：治理的中国超越研究。自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政治话语提出以来，学界展开了对当代中国治理即国家治理与协商治理的深入研究。

其一，探讨治理的中国超越。马骏<sup>[13]</sup>将“治理”概念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赋予“治理”以新内涵，并试图建构中国治理理论模型，是探索中国治理之道的积极尝试。郁建兴等<sup>[14]</sup>围绕“浙江经验”“最多跑一次”以“更大的理论担当”，“致力于求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试图突破“政府中心主义逻辑”，提出了突破性的中国方案，即“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治理。

其二，协商治理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较早论述中国协商治理的文献，何包钢主张“通过协商民主来发展协商治理，来建构一个理性、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和途径”。<sup>[15]</sup>张敏基于西方情境将“协商治理”定位为“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sup>[16]</sup>。

---

王浦劬<sup>[17]</sup>界定了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内涵、演进逻辑, 强调指出, 协商治理是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 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 还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和保障途径;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界别、政府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胡象明<sup>[18]</sup>将中国式协商治理界定为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并指出, 中国协商治理是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

## 二、对碎片化的克服: 中国治理研究的学术立场与理论精义

透过对研究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出, 学界仍然需要对“治理”做中国情境的整全性探讨以克服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倾向, 必须树立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学术立场, 特别要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之本土化因素及其核心指归梳理, 凝练基于学术的中国协商治理之基本指导的理论精义。

### (一)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治理”的学术立场

本文是基于学术意义上对协商治理的研究, 是对作为政治话语协商治理的解读与推动。学术层面对治理的阐发, 需要坚持协商治理的科学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sup>3</sup>、凝练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探索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对此, 要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多工具展开对“治理”的研究, 而无须设置过多过高的研究门槛。

需要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低水平重复研究主要表现为: 其一, 学术研究大量援引一知半解的辞藻、理论套用于并不熟知的实际, 以极其复杂的论证来说明极其简单的道理。我们对治理理论的研究理路内含有试图以西方治理之工具性倒逼中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与改革, 而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始终是要靠自己的理论突破与实践突围。<sup>4</sup>

其二, 治理研究的泛政治化。与西方治理话语的意识形态陷阱同样需要规避的是治理研究的泛政治化。“所谓泛政治化就是将政治标准泛化, 将政治作为社会事务的普遍衡量和评判依据。”<sup>[19]</sup>尽管我们赞同对“治理”展开多维研究, 但却反对低水平重复地展开“因为对, 所以对”的近意识形态化、类意识形态化研究。学术话语应该是对政治话语的解析、阐发、回应, 应该是获得新的知识。

### (二)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本土化因素及其核心指归

简单来说, 情境就是本土化的因素。<sup>5</sup>这种本土化的因素是使特定主体“是其所是”之关键所在。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本土化因素是特指使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是其所是”的关键因素。笔者认同上文研究现状综述中学界对协商治理的初步概括。但是, 更进一步来说,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本土化因素应聚焦于“官民之间”<sup>6</sup>

通过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对于“党领导人民协商治理”, 需要认识到: 其一, 两者要“……超越利益博弈的政治观, 将政治建立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 将政治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考量之上, 而不是私利竞逐的基础之上; 将政治建立在对共识的追求之上, 而不是对政策的控制之上”。<sup>[20]</sup>其二, 两者之间是在“嵌入”中国社会现实中通过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嵌入强调的是在既定政治结构框架内寻求对新的政治成分的吸纳。所以, “官民之间”应该表述为“党领导人民”。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核心指归是直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理’”的问题。协商治理的落地需要协商民主。“……治理与民主在内涵、目标、主体、程序、机制、价值等各个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 从而使得治理能够吸纳民主。”<sup>[21]</sup>西方式的民主并不等于善治。“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sup>[22]</sup>

这句话指明了协商民主的国家治理旨趣, 要将国家治理的民主质性落到实处。“党的工作的核心, 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

---

作主。”<sup>[23]</sup> 本文以为，问题关键不是对民主的质疑，而应该在于以什么样的“治理”吸纳什么样的“民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sup>[24]</sup> 凸显“治理”与“民主”的协商性，实际上是强调两者的本土化，探寻适应性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形式以推动国家治理。

### (三)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指导：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指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sup>[25]</sup>。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习近平对国家治理的基本定位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提供了基本指导。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协商治理必须建立在对本国历史之准确定位、优秀传统文化之传承和弘扬、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已有经验教训之深刻汲取的基础之上，是对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借鉴与吸收，更是超越。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及理论体系，特别是加强治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是一个迫切的任务。“理论都是主观建构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存在，取决于观察的不同视角，取决于不同语言中的概念差异。”<sup>[26]</sup>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断彰显与体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与制度体系等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经由上文的学术梳理与立场的阐发，我们试图凝练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努力规避了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困境，平衡了协商治理中的治理与民主，统合了治理的西方镜鉴与中国本位，持守了协商治理的定力与信心，坚持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

## 三、形式、困境及其应对：治理的中国实践

相对于协商治理理论，协商治理实践更加丰富多样。协商治理的实践形式，尤其是社会协商形式是多样的。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是解释现象，发掘问题，建构理论，推动实践。建构一种适应性的本土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底线性的协商治理理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基于此，以什么形式实践协商治理，应交由党领导人民去完成。

### (一)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实践形式：本土化的民主治理之路

没有民主支撑的治理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促进效率，但终将伤害公共利益，长远来看会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只能是基于民主的治理。尽管“治理能够吸纳民主”，不过治理更强调的是效率，民主推崇的是平等，两者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不容忽视。基于本土探寻适应性的民主治理之路才是正途。

中国的协商治理不是移植的，都是自身政治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自然延续，是“内生演进型”的。<sup>7</sup> 因此，中国协商治理，首先是基于正式制度安排，即“政治协商”的治理形态。

其次，在“经验性”延展的过程中，协商治理以“渐进式”的形式，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逐渐推广。需要认识到的是，由于巨大差异性的普遍存在，协商治理的实践形式，特别是社会协商形式必定是多样的，于学术研究来说，需要建构一种适应性的本土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底线性的协商治理理解，至于以什么形式实践，则应该交由广大人民去完成。

### (二) 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实践的突出问题：四种表现

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sup>[27]</sup> 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问题。对于一个使命型政党来说，能否准确把握前进道路中的矛盾与问题，特别是主要

---

矛盾与关键问题，是检验其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尺度与标准。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sup>[28]</sup>：

第一，协商治理之权威需要持续得以维护。权威能否得以坚定维护是协商治理得以有效推进的前提。权威是自觉自愿的服从。伦理主义政治文化下，中国人想要的民主是：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和群众监督政府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形式和程序；协商优先于表决；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sup>[29]</sup>。在解决了权力来源之后，中国人更关注的是权力运行的问题，中国人自觉自愿的服从自发于全面从严治党。一定意义上，权威的问题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

第二，协商治理之共识需要持续得以增强。从“治理”“国家治理”到“协商治理”，对于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西方治理与中国治理、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各治理主体存在着共识裂痕。仅以学界为例，误读“治理”、混淆“治理”与“管理”的情况并不鲜见。弱势群体在治理话语与体制中更是处于劣势。凡此种种，使得“共识”带有一定的虚妄性。

第三，协商治理之机制需要持续得以保护。举例来说，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提出，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2010年的“非公经济新36条”再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包括铁路在内的交通运输建设以及电力、石油天然气和电信建设。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的民营企业发展领域的首个中央文件再次提出，要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sup>[30]</sup>。同一议题的反复强调，就协商治理而言，说明其实践机制并不十分顺畅。

第四，协商治理之法治需要持续得以坚守。“法律制度的核心是一个稳定、刚性的制约机制，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同一标准尺度来衡量裁决问题。”但这一制度逻辑给一统体制造成的困难主要是“法律的稳定性束缚了中央政府使用运动型机制的空间和范围，限制了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独立的司法裁决又对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以刚性约束，从而限制了有效治理的灵活性。”<sup>[31]</sup>这客观上使我国的协商治理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法治困境。

### （三）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实践推动

依循上文的阐释，当代中国的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协商治理。因此，推进中国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最主要的就是巩固执政党权威。执政党权威的巩固可以从党内与社会两个层面来看。就党内而言，巩固党的权威需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必须充分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能有差不多了，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长期坚持下去，任何时候都放松不得”。<sup>[32]</sup>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sup>[33]</sup>。

同时，执政党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需要“超越资本绑架、派系斗争，维护核心，缔造共识”<sup>[34]</sup>。要巩固执政党权威，必须努力促成广泛共识，塑造健全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与对于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类似，对于如何达致共识、健全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学界同样给出不同的视角，开出不同的措施。正如本文一直所主张的，相较不同的措施，需要特别保持定力与信心。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sup>[35]</sup>

## 四、比较维度的中国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性

---

经由上文分析可见，现有研究存在忽略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条件的情况。对当代西方治理的嬗变及其理论适用性的基本梳理，特别是对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基本理解，有利于我们形成对当代西方治理意识形态性的理性认识，对于形成超越性的本土治理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借鉴与批判: 当代西方治理的嬗变、理论适用性及其困境<sup>[11]</sup>

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转化及福利国家的危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冲击等理论与实践的变迁为当代西方治理提供了机缘。治理迎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需求，以问题倒逼改革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稳步前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协商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协商符合普遍意义上的“治理”意蕴，是西方治理理论适用性之“治理何以可能”层面的意涵。从“治理何以可能”来看，推进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协商治理，是治理理论适用性过程意义的集中概括。

但在涉及定义、内涵等关键问题上，治理理论始终未能摆脱不足。其一，“治理”概念的模糊性、宽泛性，固然使其可以为持不同立场的流派所接受，但严谨性不足。尽管这增加了“治理”的包容性，但却给共识的凝聚造成了阻碍。其二，治理理论所关注的公私关系早就在政治学、经济学等研究的视野之内，其论题更像是价值主张或社会思潮，如以市场为中心或以网络为中心的不同治理流派等。实践中，治理同样存在失败的风险与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当代西方治理话语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行为方式的重新诠释。意识形态性造就了当代西方治理的另一实践困境。

#### (二) 中西方治理的比较与透析: 更好治理的中国方案

国家治理的兴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既因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又实现了基于本土的超越。

第一，治理的中国方案及其实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立足中国的同时胸怀世界”“以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观察和分析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矛盾与问题”“从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善全球治理、探索人类更好制度等方面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sup>[36]</sup>，从社会制度、经济治理、全球治理、互联网治理、气候治理、贫困治理、政党治理等各方面全方位阐释了各自领域内的“中国方案”。

一定意义上，西方治理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实践在全球学术与政治崛起的标志。但中国情境下的“治理”话语的兴起不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与巩固的产物”，更不是“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sup>[37]</sup>作为“可治理的民主”<sup>[38]</sup>，中国方案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sup>[39]</sup>。中国方案凸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话语到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周密部署。中国方案存在于中国道路之中，中国道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中西方治理的本质差异存在于制度领域，具体反映在体制及其政策实施层面。中国的制度优势可以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彰显了制度优势。西方治理的凝聚力下降、治理主体萎缩、治理功能弱化导致国家治理乏力、无效、衰败。从体制及其政策实施角度来看，“党政体制”是“……唯一有能力、有一定意愿约束市场化过度扩展的社会主义因素”。

这在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金融整顿、精准扶贫等诸多方面得到印证<sup>[37]</sup>。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sup>[40]</sup>我国的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要实现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走向更好的治理: 探索中的协商治理。中国协商治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助推理论，二者是有效互动的。协商治理通过治理对民主的吸纳，发挥了治理与民主各自的长处，实现了治理与民主之间的平衡。中国协商治理既有对西方治理的借鉴，

---

又有对其本质的批判，更是基于中国本位的超越。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成就的取得是定力与信心的持守，根源于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sup>[41]</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实践还在不断深入。新的协商治理实践必将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协商治理实践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开展新研究，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推动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这体现了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的一致性。

## 五、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不是结论的结语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研究应具备基本的立场。这是“观察、认识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协商治理本身，同样具有实践立场。这是“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是互相影响的。观察、认识问题的态度直接反映在对问题的处理上。处理问题的态度在反映观察、认识立场的同时，触动其作出调整与变化。本文试图以学术呼应实践，实现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的共进。

当前，从对习近平所言“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sup>[42]</sup>出发，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立场至少应该有：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平衡协商治理中的治理与民主、统合治理的西方镜鉴与中国本位、持守协商治理的定力与信心、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

诚然，本文是从宏观视域做出的初步探索以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力图避免重复叙事以造成学术浪费。而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内在机理与基本立场逻辑框架更为细致的挖掘，比如对“人民民主的真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之多维度的考量，则需要学界更加细致而深入的探究，切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2]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 年第 7 期。

[3] 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 67 页。

[4] 林毅：《“不变之变”的启示：福山叙事变迁探析中的反思与中国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5]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15 页。

[6] 徐勇：《GOVERNANCE: 治理的阐释》，《政治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7] 陈振明主编：《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 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8-134 页。

[8] 李泉主编：《新自由主义研究与批判》，格致出版社，2019 年版，第 154-188 页。

- 
- [9]王浦劬、臧雷振编译：《治理理论与实践：经典议题研究新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Stephen P. Osborne：《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 [10]田凯、黄金：《国外治理理论研究：进程与争鸣》，《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
- [11]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12]翁士洪、顾丽梅：《治理理论：一种调适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杨雪冬：《论治理的制度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 [13]马骏：《理解中国治理的广东样本——广东经验的理论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14]郁建兴：《“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 [15]何包钢：《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建构一个理性且成熟的公民社会》，《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 [16]张敏：《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
- [17]王浦劬：《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特点》，《求是》，2013年第10期。
- [18]胡象明：《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学术界》，2013年第9期。
- [19]胡键：《高校行政干预可能导致政治宣传取代学术研究》，2019年7月24日，[https://www.sohu.com/a/326687795\\_782639](https://www.sohu.com/a/326687795_782639), 2020年1月7日。
- [20]谈火生：《协商治理的当代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110页。
- [21]佟德志：《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页。
-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 [25]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 [26]潘维：《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 [27]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新华网，2015年1月24日。
- [28]魏崇辉：《公共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批判的理路与话语的构建》，《行政论坛》，2018年第5期。

---

[29]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285页。

[30]辛省志：《支持民营经济要敢于打破行政垄断》，2019年12月27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73121?from=nfzmxw>，2020年1月5日。

[31]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36页。

[32]钟纪言：《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2019年第3期。

[33][4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34]郭苏建：《转型中国的治理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3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36]杜飞进：《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论习近平同志的东方智慧与全球视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7]文明超：《“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读书》，2019年第4期。

[38]杨光斌：《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39]周文、包炜杰：《中国方案：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3期。

[4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42]习近平：《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

#### 注释：

1 从应然层面来看，学术应该是引领、呼应实践，与实践形成有效互动。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是通过中国人民勤劳自然演进得来，学界却乏善可陈。学术的“投机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存在。当某一议题纳入到政治话语之后，大量不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涌入，导致文献激增，但很快又因为政治话语的转移而退出这一领域，转而追逐其他“热点”。本文将基调定位对实践的“呼应”，是在纠偏上做出的尝试。参见谈火生、杨婕：《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学重要概念的变迁及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2 该决定指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区”“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积极地逐步地改变生产条件，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设早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2007年6月7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07/t20070607\\_11631290.shtml](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07/t20070607_11631290.shtml)，2020年1月6日。

---

3 翟学伟提出“描述-情境-诠释”、“语言分析”和“讲故事”等是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有效方法。参见欧阳晓明：《认识中国：社会研究的本土视角与方法——翟学伟对中国社会研究方法的探索》，《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 谢遐龄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政治”一词在中国具有政治、经济、伦理三种意义。参见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页。

5 “中国”这个关键词与本土化议题有关系。如果没有强烈的情境意识或者本土意识，很容易导致研究价值迷失。我们需要搞清楚“中国”基本要义在公共管理中的体现。参见何艳玲：《好研究是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兼论“中国”作为方法论》，《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4期。

6 “官民之间”的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既是对西方“公民之间”协商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实际的肯认。两者在利益一致基础上通过“嵌入”社会现实发生关联。对“嵌入”机制的理解，参见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8页。

7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治理驱动的民主化”（governance-driven democratization）。主要形式有：规范化和民主化既有的“政治协商”，并将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同时，“经验性的、渐进式的”，策略上，“在各地试验新的方法，接受那些成功的实验，然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熊玠：《把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时代〉选载》，2018年3月27日，[http://www.ccps.gov.cn/zt/xjpsdxz/wz/201812/t20181211\\_118033.shtml](http://www.ccps.gov.cn/zt/xjpsdxz/wz/201812/t20181211_118033.shtml)，2020年1月24日。